

69

# 奉贤文史资料

第10/12期 (1991)

奉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6月10日

##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专辑

- “体态风流晚节刚”——记李主一烈士 姚金祥
- 拨开迷雾，奔向光明——记丁锡三起义前后 周正仁
- 光辉历程，不朽业绩——奉贤县党建史简介
- 县委史志办公室
- 一颗红色的种子——忆原中共淞沪工委奉贤南桥支部
- 杜 及
- 第一次参加庆祝党的生日的回忆 刘建平
- 回顾奉贤县委交通事业光辉里程
- 中共奉贤县交通局离休党支部

## “体态风流晚节刚”

——记李主一烈士  
姚金祥

### “布置洪炉铸少年”

李主一，1892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奉城东北李家埭（现在是洪庙乡洪西村第七组）。父亲李梦祥，是个晚清秀才。李家是大户人家，李梦祥生下三儿二女。三个儿子取得三个有趣的名字，叫“主一”、“不二”、“反三”。就学之后，便有学名，分别称宪章、云章和玉章。李主一的排行居首，他后来又曾用过“李羔”的名字。李主一在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之后，就读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附属中学（一说南洋中学）。大革命起，李主一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目睹军阀混战，他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满目旧疮痍，方欣残喘延。警传风鹤讯，怕见甲兵连。有类惊弓鸟，其如无法天。怜兹孑遗辈，何日庆安全！”

李主一读完中学后，回到了家乡。不久，便在奉城以东的洪庙陈公祠内办学，取名竞成小学。当地人习惯称为洪庙小学。他当校长，这时才19岁。后来，李主一曾离开奉贤去苏北从事过垦荒，到上海去上大学。到1920年，李主一重新在青村办学校，并向县教育局推荐卫伯康担任校长。校名改为集成小学，沿用至今。

李主一办学，用他的话来说，目的是“布置洪炉铸少年”。因此，洪庙小学注重招收农民子弟读书，规定凡农民子弟上学，可免缴学费，家境实在贫穷的，连书费都不收。学生缴的学费不够支付教师薪水，他就自己补贴。有些学生购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把自己用的笔墨、砚台、簿子等送给他们。有些农民的孩子，常常读不了多少时间就被迫辍学，李主一知道后，便主动上门反复动员。象他家邻居的孩子李和，从1岁到14岁，先后停学4次，但在李主一的帮助下，终于读完了小学。有时老天刮风下雨，路上行走不便，李主一还用船亲自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因此，全校的教师、学生平时

对李非常亲近。那怕有时李主一利用星期日到野外去散心打猪草，村上的孩子也喜欢跟在后面一起跑。而到吃饭时，李主一总是说：“你们肚子饿了吧？我去买给你们吃。”

平时，李主一对农民群众也非常亲近，并无“大少爷”架子，农民们也喜欢去他家坐坐，有时便在他家用膳。当时，李家从南汇雇了一个女佣人，李主一每次回到家中，总要向她表示一番感谢。那个老妈妈感叹地对人说：“李先生待我真客气，就象家里人一样看待。”

## 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大大开阔了李主一的政治视野。

“五四”运动后，他从上海“创造社”买回大量进步报刊和有关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到1925年，李主一入上海大同大学读书，结识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林钧。在林钧的引导下，他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不久，林钧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8月间，李主一回到家乡，在奉城筹组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届县党部。李主一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李主一常常奔走于上海与奉贤之间。当时的上海，反动派大刀队横行马路，但他并不把它放在心下。有一次，共产党组织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十六铺一带去拿一批党的文件和其他革命宣传品。一路上，反动派设下许多哨卡，如不小心，随时都可能遇到意外。李主一接到任务后，将文件和传单放在敌人一般不会注意的穿在脚上的长统袜中，结果巧妙地混过了检查者的眼睛。

李主一等人到处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广大农民、盐民和渔民，积极开展各种斗争。没有多久，奉贤县从地处东南海隅的小民福店头，一直到西部边界的庄行、烟墩、盛桥庙、葛舍庙等地，农民革命运动象东海浪潮，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了，有的地方秘密成

立了农民赤卫队。

1927年春，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奉贤县的地下党组织发动里护塘沿线的盐民举行暴动。平时饱受盘剥的盐民们，成群结队地冲向前去，焚烧了盐碱的房子，背走了盐碱中的食盐。平时耀武扬威的盐警们吓得各自逃命。盐民们暴动配合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北伐军到达时，全县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从3月10日开始到4月2日止，国民党奉贤党部在奉城县立第一小学召开了为期1天的代表大会，省特派员方正、金学成也前来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李主一、陈枕石为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复选代表。大会主席李主一再次被选为县党部的执行委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了全县原有的农民协会，成立了由他们控制的农民协会。李主一利用合法身份为掩护，同反动派展开了巧妙的斗争。同年7月中旬，国民党奉贤县党部、县教育局和县教职员会联合开办暑期讲习会。李主一在上级党组织的同意下，利用这个机会请来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晓等同志担任教员。

训练班设在南桥公共场所（现奉贤县中心医院处）。报名听讲的有本县农村师范刚毕业的学生，还有在上海念书的大学生，而最多的是小学教员，共约二三百人。由于训练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刘晓等得以顺利地国民党的讲台上讲解社会主义，讲中国的农民运动和世界革命史。为期两周的训练班一直办到8月3日结束。

但这时国民党右派正在搞所谓“清党”，省党部特派员陈以恒匆匆到奉贤解散了原来的县党部。1927年8月8日，李主一被解除了县党部执行委员的职务。

## 创办曙光中学

南桥暑期训练班结束后，李主一又邀刘晓同志等来到奉城，共同创办了“私立曙光初级中学”。办曙光中学名为“私立”，实是

（总118）

党组织的决定。目的是为了掩护大革命失败后幸存的一批革命力量，并开展奉贤地区的革命斗争。李主一为该校校董，除教学业务由校长徐宗骏负责外，筹集经费、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均由李主一负责。

曙光中学的教职员，前后不少于二三十人，流动性比较大。有的上一二个月课，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便走了；有的只是挂一个教师的名义，实际并不教书；有的虽然住在曙光中学，但却在附近小学里教书；还有的是一时找不到落脚点的地下党员，暂且来借宿几日，象严朴等就是如此。当然也有比较固定的，如刘晓，他从曙光中学开始创办一直到反动派查封，始终没以离开过。学校共有1个班级，一百几十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奉城附近农民和盐民的子弟，但也有从奉城甚至从邻县南汇周浦中学转来的。周浦中学当时闹学潮，许多学生跟反动派校方展开激烈斗争后，在原校已难以立足。李主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同意他们转到曙光中学来。为了振奋革命精神，李主一、刘晓嘱教师王原生（即方土人）编写了校歌，配上当时在革命青年中流行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谱，让学生们歌唱，歌词是这样的：

“望东方曙光、曙光，  
一轮鲜红的太阳。  
照着工房，照着农场，  
照着红旗飘扬。  
冲破黑暗，我们建设，  
曙光的天国在地上。  
我们有铁的纪律  
和红的热血欢唱，  
革命青年，团结起来，  
追求革命曙光。”

创办曙光中学，首先碰到的是经济问题。那时党正在困难时期，无法筹集到大数目的资金。李主一决定自己想办法。

这年秋季的一天，是李主一祖母去世一周年忌日。李主一打破

常规，力排众议，决定不给死人做“道场”，而把省下的大笔费用作为曙光中学经费。在这之后，李主一还经常设法资助曙光中学。有一次，他把家里刚收来的十几担租米及几十元零用钱，全部送给学校。

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李主一还亲自带了师生，到四团、头桥、奉城等镇上去募捐，也向李家同族地主募捐。靠着群众的力量和李主一平时的为人，每次都募集到一笔款子。学校的经济困难，便这样克服了。

## 追求革命曙光

曙光中学建立后，李主一、刘晓等马上着手扩建党的队伍。他们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支部，直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刘晓担任书记，李主一担任组织委员，并负责支部与省委间的联络工作。

李主一和刘晓利用举办暑期训练班时结识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在南桥地区发展了四五名党员，组成南桥地下党支部。同时，在曙光中学内还建立共青团组织，任命了共青团县委书记，并组织了“读书会”等进步团体，发动青年开展散发革命传单等各种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逐步开展，曙光中学渐渐成了当时浦东地区的一个革命中心。奉、南、川三县的地下工作同志经常在这儿接头和聚会。1927年8月7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隔了一段时间，中共浦东县委书记林钧来到曙光中学，秘密召开了浦东奉、南、川三县党、团员骨干会议，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

曙光中学的学生，各有两套课本：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秘密的。公开的那套装门面，用以应付国民党教育局长、哲学等人的检查；秘密的这套是学校里自己编写油印的，其中不仅有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且还选录了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曙光中学还教学生们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曙光中学后院的一间小屋，秘密陈列、珍藏着全国各地出版的许多革命书刊，其中有共产党中央先后编辑的《向导》、《新青年》、《前锋》、

《布尔什维克》等等。从中可以读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和讲话，还可以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译本。这类革命书刊，“四·一二”前后不少被反动派查封、烧毁，上海市区已很难找到，但在奉贤，由于曙光中学的存在，它仍然被什袭而藏，成为革命师生的精神食粮。师生们亲切地把这小屋称之为“红角”。当时，在教师小寝室的天花板上，还有一个小阁，是地下党的秘密“红角”室。党内同志可以钻进去轮流阅读党的秘密文件，外面风声一紧，李主一就会教人把“红角”里的书刊全部隐藏起来。因此，尽管反动派当时也风闻曙光中学在宣传“共产”，不止一次来“检查”过，但直到最后封闭，也没有拿到任何证据。

曙光中学的师生，除了教书和学习之外，还经常深入到附近农民和盐民中间，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轮流去给那些无力上学的农民子弟上课，李主一还亲自同刘晚一起，带领师生到离奉城四五里地的久茂村一带，开办夜校，成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妇女会，开展各种活动，农民协会组织后，在久茂村一带，开办夜校，成立农民协会和组织妇女会，开展各种活动。农民协会组织后，在久茂祠堂曾经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五、六百人之多，会后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大家手拿标语纸，沿着新排路，从久茂祠堂一直游行到曙光中学操场上。一路上，农民们奋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农民们团结起来！”当游行队伍经过大财主家门口的时候，还故意停留一段时间，口号喊得格外响亮，吓得一些财主急急从后门溜走。

李主一对子女管教十分严格，常对子女说：“一个人要诚实，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平时也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说将来我们中国要消灭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有一次，李主一偷偷将一箱子党组织的枪枝转移到自己家里，恰巧给女儿看到了，他叮嘱女儿说“小孩子，不可多嘴！”由于李主一的精细、谨慎，在他被捕前，家里无人知道他的共产党员身份。

曙光中学，就象一把火炬，熊熊燃烧在浦东大地上。广大农民

群众和青年学生热烈欢迎她，高度称赞她。但曙光中学过于暴露，太“红”了，因而招致反动派的反对和围攻。

当时，大财主廖味荃等人纷纷写信给县教育局长阮志道，密告曙光中学“名为学校，实为共产机关”，唆使阮对曙光中学采取措施。阮志道一方面借“视学”为名，三番五次来到曙光中学，想抓把柄；一方面禀报反动县长邓群襄（又名邓赞华）。邓听到报告，曾密令军警到曙光中学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却发生了突然事件，灾祸降临到了曙光中学和李主一的头上。

原来，中共南桥支部的党员、南桥望霓小学校长徐宝椿和教师胡秉一，曾在1928年3月14日深夜在南桥镇散发革命传单。接着，庄行、青村、奉城等地也出现大量传单。敌人顿时惶惶不安，说共产党要在南桥搞暴动，县公安局长龚赞尧亲自率警搜查了望霓小学，校长徐宝椿和教师胡秉一被逮捕，在徐宝椿身上搜出一封写信人署名为“周南校”的信件，收信人是奉城曙光中学陈兆兰。“周南校”是南桥支部的代号。这封信是南桥支部给县委的一份报告，准备通过陈兆兰转交给刘晓、李主一的。3月27日，陈兆兰被捕。4月3日，县政府查封曙光中学。大门的封条上写着：“曙光中学李主一等共有共党嫌疑，勒令封闭。我党一手创办起来的革命学校——曙光中学，在开办一个半学期之后，被敌人强令解散了。而曙光中学师生，由于事先已从敌人内部得到情报，加上学校放春假，马上转移的转移，隐藏的隐藏，没有受到损失。

在曙光中学出事之前，李主一为了护送林钧回上海，先期离开奉城。李主一撤离前夕，销毁了自己家中所有的革命书刊，因此，反动派到李家搜查时，什么证据都没有捞到。

## “死得其所”

李主一得知陈兆兰等被捕的消息后，即准备设法营救。3月29日（农历闰二月初八），李主一带着县委的一封信，赶到普陀区小沙

（总122）

渡饭店(据说是小沙渡路一号)党的秘密交通机关(一说在闸北区省委组织部交通机关),谁知这时交通机关已被英帝国主义巡探侦破。李主一一踏进机关,就被守候在那里的1455华探抓住,押到了戈登路英帝国主义巡捕房。与李主一同一天被捕的还有曙光中学教师范志超以及地下党员董冰如。

在巡捕房,敌人对董、范两人审讯无结果,就引出李主一进行“对质”,范志超猛然见到李主一,心里一急,抢着说:“我不认识他。”李主一虽无思想准备,但也镇静地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他们。”巡捕房的暗探恼火了,李主一当场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刑罚:用皮鞭抽,用脚踢,上电刑,还上老虎凳……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仍咬紧牙关,一口否认。第二天,范志超被保释出狱。由于李主一坚持不招,敌人无法了解到董冰如的真实身份。11多天后,董冰如也被释放。

4月下旬,李主一被解到四马路总巡捕房。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约11时许,他妻子顾吉仙买通关节,在巡捕房门外同李主一偷偷见了面,时间仅5分钟。李主一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的精神仍然很好。顾吉仙问他受刑的情况,他轻描淡写地把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和上电刑等情况简略说了说,妻子没有听完就哭了,但李主一却安慰着说:“不要紧、我能出来的。”

5月上旬,李主一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李主一自知凶多吉少,所以当顾吉仙第二次到龙华看守所去探监时,他透过牢中装着铁栅的小窗洞,意味深长地对她说:“我不死的话,总有办法的,我如果死了,你不要哭泣。我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不要为我多花钱。要替我在曙光中学后面买两亩田,就把我葬在这块田里,坟墓旁立一块碑,碑上题“死得其所”4个字,这样我虽死犹生……”。

1928年6月21日黄昏,李主一拖着镣铐,又一次被叫去审讯。李主一回到牢房就开始写信。他告诉难友们:“今晚他们要枪毙我了。”说着,就把平时穿的衣服和用的一些东西,一一分给了同监难友。并告诉难友,如果有机会的话,请把他死的情况告诉上海党

组织。李主一被枪杀之后，他的遗体被反动派用毯子裹起来丢到了墙外，直至今日不明下落。

李主一就义前写的那信，狱中地下党帮助寄了出去。原来，这封信是写给范志超和董冰如的。李主一的信写得很长，除了鼓励和安慰范志超要好好保养身体，将来更好地工作外，还劝慰董冰如同志不要消沉，不要离开组织，一定要为党好好地工作。

烈士生前，在以《夹竹桃》为题的词中写到：“君子品，美人妆，体态风流晚节刚，不与凡花争俗艳，芳姿个个倚幽篁。”李主一烈士不就是一株人人争颂的“体态风流晚节刚”的“夹竹桃”吗？

1957年，奉贤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奉城中学改名为曙光中学。同年，又在曙光中学校园内为烈士树立了纪念碑，按照烈士的遗愿，在碑上写着“死得其所”四个字。

李主一烈士虽死犹生！

## 拨开迷雾 奔向光明

——记丁锡三起义前后

周正仁

丁锡三，上海市奉贤县郭家桥（今郭桥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郭桥地区组织浦左警卫队，1938年夏编为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第三支队，后改称第八支队，丁任上校支队长。1939年10月，丁被上司何天凤骗至上海虹口软禁，胁迫降日，所部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委丁为中将司令。旋又编为伪和平建国军暂编第十三师，丁任中将师长。就在丁被胁迫降日时，丁母为下乡扫荡的日军所杀害。1941年冬，伪十三师移驻绍兴不久，丁发动起事，由于副师长李燮宇与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告密而为日军拦截，十三师师部、二十六旅和师教导团等全部缴械（仅二十五旅李启蒙部突围投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建制撤销，部队编散，丁锡三被押解南京，经伪特别军事法庭判处终生监禁（即无期徒刑），由南京移解伪镇江模范监狱。1944年3月，在镇江附近的丹北地区新四军的支持下，丁旧部周士熊、潘毅等潜入镇江武装劫狱成功，由新四军接应并护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受到苏中一分区司令员刘先胜等领导热情接见，在解放区观摩活动近3个月之久。在丁的要求下，新四军派小分队由海上护送他们一行20余人回到浦东，丁部重被编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序列。同年底，丁部与马柏生部合编为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丁任少将副总队长，由于丁马之间面和心不和，故各自率原班人马活动，人称“马总部”“丁总部”。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总部”留驻奉贤，编为县保安司令部，马柏生任奉贤县县长兼保安司令，还治南桥镇。“丁总部”却一再受到编遣，先改编为别动军十二纵队二支队（近2000人枪），调防他处；1946年3月又改编成交警十总队二大队（仅600人枪，余部编入三、四大队），丁由支（总125）

队长改任大队长，后开赴胶东前线打内战。不久，丁的心腹五中队长潘毅、四中队长孙皎相继被解除职务，丁本人也只留了个少将专员的空衔，他们三人便由胶东回到了上海。官场失意，部下失业，经济拮据，甚至在上海租借的住房也被三战区副长官上官云相所占，这不仅使丁锡三陷入了困境，而且还憋着一肚子的窝囊气。

1946年4月，新四军华中军区海防总队（简称海总）政治委员吕炳奎，布置原浙东纵队海防大队（1945年北撤后编入海总）秘密联络员张金根（化名张宗琪），建立上海至苏北的海上交通线，设法为解放区购买与运送货物，特别是军用物资。张接受任务返回上海后，一面开设宏泰运输行与苏北鸿济贸易公司（海总秘密据点，吕炳奎政委以总经理身份进行活动）做生意，一面物色对象搞军用物资，张金根与丁锡三都是奉贤县人，虽未见过面，但张对丁的情况比较了解。当丁锡三被解职闲居上海后，张通过原二十五旅旅长李启蒙与丁接触，达成以张的名义为丁转手埋藏在郇家桥老家的百余箱梯恩梯（TNT）军用炸药和全套雷管的协议，并派员随同军火由张家厍（今金山县境内）海口运往苏北解放区，得到几十两黄金的货款，解了燃眉之急，丁对此很是感激，又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思前想后，丁锡三终于提出要求与苏北共产党见见面的意向，张金根及时向海总作了汇报。同年11月，经中共苏中海上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研究决定，派遣海委秘书陈学勤到上海，由张金根负责掩护并协助工作。不久，在上海大世界对过的三和楼茶室二楼，陈与丁首次会面，以后又进行过多次交谈，做丁锡三的工作。1947年2月，海委改派秘书虞天石接替陈学勤，继续与丁接触。经过陈、虞一段时间的工作，丁锡三终于下了起义的决心。为安排丁锡三一行赴苏北，经海总吕政委同意由张金根以运输行的名义购买机帆船一艘，专供起义之用。

1947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饭店四楼的一间套房内，经过一番热烈议论之后，丁锡三作出起义部署：孙皎等人携带1挺轻机枪、20余支卡宾与汤姆、20多箱子弹和药品等物资，由张金根负责安排，

（总126）

于1月13日(农历六月廿七)晚,从张家厍海口运出,在查山海面会师;丁锡三、虞天石率其余20多人,在上海乘机帆船于15日夜出吴淞口,两船会合将物资驳过后,直驶解放区。部署定当,分头行动。

孙皎、张金根一路,把丁锡三老家运来的枪枝弹药,全部装上停泊在张家厍海口外那艘名为“金保利”的帆船上,由于船大潮小,13日无法开航,为安全计,将物资搬上小船,随潮漂在海上,以防不测。14日下午6时许,小船上的物资重新装上大船,待押运人员上船后即可启航。突然,从奉贤方向开来卡车1辆,几十名保安队兵士跳下车来,将海口封锁得水泄不通,张金根等人见状,真是心急如焚,不知是鄆家桥运枪被发现,还是上海出了事,面对这一局面该怎么办,只得视事态的发展再作处置,来者的目标是注意出海人等,对海面并不在意,只准人上岸,不许人下海,无搜查海上船只的迹象,15日拂晓过后,南桥传令兵赶到,传达了县保安队着该部立即返回的命令。一夜没合眼又提心吊胆的保安兵士,象得到了“赦令”似的争先恐后地爬上了汽车溜走了。原来,奉贤县县长奚永之得到情报:丁锡三一行于14日晚由张家厍出海去苏北,故立即派队堵截。后又说丁从上海出走,所以将部队撤回南桥。张家厍的敌情是解除了,但上海方面的情况却不得而知,因此,孙皎立即由张家厍返沪与丁老板(其部下这样称呼丁锡三的)联系,张金根安排帆船驶离码头后赴沪接受任务。

上海南京饭店四楼一套房内的日历,已翻到了8月15日,正焦急地等待着张家厍安全启航消息的丁锡三、虞天石,忽见气急喘喘的孙皎闯了进来。当听完孙的报告后,知道国民党当局对此举已有察觉,必须改变计划,先派员去吴淞侦察后再作决定。然而,吴淞口检查很严,又不熟悉过吴淞口出海的关节,一时举棋不定。海委秘书虞天石是与苏北单线联系的,一时也无法取得上海地下党的帮助。此时此刻,真似“度日如年”,弄不好随时将会发生意外,所以加强了对饭店周围的观察,作好应急准备。等到张金根17日赶到上海后,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在丁、虞的组织指挥下,开始有条不紊

(总127)

地实施着。

张金根派往吴淞摸情况的人回来了，证实吴淞口封锁严密，凡货船，客轮都要检查，无法载人通过关卡。于是，决定放弃在关桥码头登船的计划，让空船报关先驶出吴淞口待命。17日晚9时左右，机帆船驶抵吴淞后，由张金根宏泰运输行雇员通过吴淞镇代办船只出口的一家老关系黑关行，拿着填有去宁波的航运簿，到江海关办妥手续，经吴淞检查站验证、检查后放行。机帆船出了吴淞口，泊在三角水处待命。机器仍在隆隆地工作着，以便应付随时会发生的紧急情况 and 及时接应起义人员的到来。

那时的上海滩，阔佬们租了游艇夜游黄浦江避暑消遣的不少，而这种游览船是不出吴淞口的，因此在黄浦江上一般不会被检查，这对丁锡三他们实施第二步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得到机帆船平安出关的报告后，丁锡三、虞天石等一行20余人，分乘1艘游艇于18日凌晨2时，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游览”黄浦江，浦江两岸闪烁着灯火，江内时续时断的汽笛声，穿梭似的外国军舰与炮艇，船尾卷起的巨浪，摇曳着搏斗在浪里的小船，帝国主义者是不管中国人民生死的，他们拿中国人民的生命来寻欢作乐。一路上谁都没有心思去观看这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浦江夜景，然而，尽管大家怀着紧张、激动和愤怒的心情，但却装出一副幽闲自得的样子，把即将要投入革命怀抱的喜悦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都深深地埋藏在心田，聚精会神地准备应付万一发生的突变。3时许抵达吴淞口时，恰遇雾气正浓，在这天然屏障下，顺利闯过关卡，于三角水处换乘机帆船，直驶查山海面会师。张家厍帆船的军用物品驳过来船后，到宁波装货去了。丁锡三一行起义官兵，在海委秘书虞天石率领下，朝着苏北解放区急驶而去。

丁锡三一行抵达苏北后，受到中共苏中区委书记陈丕显、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等领导的接见。1948年2月，丁锡三由吕炳奎、汤景延介绍，经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经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批

(总128)

准，任命丁锡三(化名丁旭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师级建制)司令员、汤景延(化名张玉)为纵队副司令员。同月9日，丁、汤率60余名指战员，在苏北斗龙港南下，13日(年初四)零时左右于奉贤县钱家桥(今钱桥乡)石桥头外登陆，凌晨3时许西进至潘家角(今奉贤县胡桥乡境内)地区。由于孙皎等先遣人员被叛徒刘葆珊出卖遭逮捕和事前未与浦东地下党、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取得联系而无接应，加上丁派外甥王荣上岸联络途中叛变和丁旧部徐顺庆的出卖，当日下午4时即遭到国民党军警团队的袭击，经几度被围、突围，自浦南的松金奉交界一直转战至青浦县西部。2月18日(年初九)，部队乘船进入拦路港北上至安庄镇(今青浦县沈巷乡)附近时，与该处地方团队遭遇，被迫弃舟于西岸登陆，转移到尤浜村(今青浦县莲盛乡)。12时左右，为避免当地群众受损，部队撤至一独头圩(四面环水)内，遭国民党青年军152旅155团一部和青浦、松江两县地方团队的围攻，苏浙纵队56名指战员全力抵抗。激战至下午3时许，终因孤不敌众，丁锡三司令员等14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汤景延副司令员等42名指战员被俘(汤等近20人先后被害)。丁锡三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将其头颅割下，先后挂在朱家角、青浦、闵行与南桥等城镇。

解放后，丁锡三忠骨移葬于上海烈士陵园。

1991年4月28日

(总129)

## 光辉历程 不朽业绩

### —— 奉 贤 县 党 建 史 简 介

1924年，中国共产党人来奉贤，在群众中宣传有关苏维埃和列宁等情况。1925年，洪庙人李主一、四团人金学成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七八月间，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李主一奉命回到奉城筹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首届奉贤县党支部，并开始在县内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为响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党员林钧、金学成、李主一等，于1927年3月在奉贤东乡沿海一带和西乡庄家行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下，奉贤党的工作受到挫折，农民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7年7月，中共党员刘晓等奉命来奉贤，加强了党对奉贤工作的力量。8月，刘晓、李主一等在奉城创办曙光中学，不久成立中共曙光中学特别支部，同年10月组建中共奉贤县委，均由刘晓担任书记。1928年1月，中共浦东县委在曙光中学内成立，奉贤县委同时撤销。同年3月，中共南桥支部散发传单不慎而遭破坏，并涉嫌曙光中学；李主一赴沪联络工作时又不幸被捕（同年6月21日就义于龙华监狱）。4月3日，曙光中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校内中共党员有的回上海、有的脱离组织。刘晓等转移到西乡农村，发动群众，继续斗争。6月16日晚，中共党员周大根、赵天鹏等3人奉命赴四团镇，处决恶霸地主张沛霖，在返途中赵等被捕（同年7月2日就义于四团），不久，小庙、四团等党支部相继遭到破坏，东乡党的建设受挫，同年11月，按照中共淞浦特委决定，中共奉贤县委恢复成立，刘晓任书记。此时，全县党员发展到134名，建立16个支部，县委的工作重点在西乡。

1928年秋，县委提出“不完租、不还债”的斗争口号，深得农民拥护，这也使土豪劣绅惊恐万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农民实施报复。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于1929年1月21日晚

(总130)

上发动了庄行农民武装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的反动气焰。但由于过早地暴露了党的力量，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不少骨干落入敌手，暴动领导者之一的唐一新等惨遭杀害。至1931年初，全县大多党组织已遭破坏，东乡的20余名党员归南汇中心县委领导，西乡8名党员归松金县委领导。不久，南汇、松金县委亦遭破坏，奉贤党的活动终止。

1938年1月成立中共浦东工委，奉贤县东部属其管辖。同年夏，中共党员蔡辉在泰日桥一带筹组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后因国民党忠救军火并而被迫终止。1940年12月，浦东工委在平安民桥组织党支部，奉贤党的组织得到恢复。1941年5月，中共浦南工委成立，奉贤西部属其管辖。至抗日战争胜利，全县共有7个党支部和71名党员。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淞沪支队（包括前身）在奉贤境内对敌作战10余次，毙伤日伪军警、俘获伪军、策反伪军各百余人。淞沪支队近30名指战员，在奉贤的这块土地上，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使刚从侵华日军蹂躏下解放出来的浦东浦南人民，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对付这一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淞沪工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武装来对付反革命武装。1946年8月，三团港支部遭破坏。1947年2月，南桥党支部成立。至奉贤解放时，全县仍有7个党支部，党员110余名。其中吴行埭与西陈家宅2个支部，由于有关部门未向奉贤县委办理移交而失掉组织关系。在这一时期，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包括前身）在奉贤境内对敌作战20余次，毙伤敌13人，俘获26人，有13名指战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奉贤的土地上。

1949年5月14日奉贤全境解放，南下途中组建的中共奉贤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率干部于17日到达南桥，开始了对国民党所有机构的全面接管。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全县党员人数由1949年的230名发展到1966年的10000名。广大党员在县委领导下，与

（总111）